



浅谈几件中国藏黑水城文书所反映的元代用纸*

魏琳

内容摘要:造纸术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它对于中国乃至世界文明史的发展、演变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关于历代用纸,集中于唐宋明清研究者居多,多为撰述官府公文及佛经抄写用纸,对其造纸原料、特性、名称等等内容论述较完整。而有关元代纸品,则往往语焉不详。笔者在查看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过程中,发现几件有关元代纸名的文书,有益于补充元代用纸,反映其造纸工业的发展状况。

关键词:造纸 法明纸 清水纸 亦集乃路 文书

造纸术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它对于中国乃至世界文明史的发展、演变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纸自西汉发明以后,历经千年,其间技术不断革新,各朝纸品花样繁多、层出不穷,纸品名称亦有自己的时代特色,让人目不暇接。关于历代用纸情况,集中于唐宋明清研究者居多,多为撰述官府公文及佛经抄写用纸,对其造纸原料、特性、名称等等内容论述较完整。而有关元代纸品,则往往简而概之,语焉不详。笔者在查看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过程中,发现几件有关元代纸名的文书,其对于补充元代用纸及反映元代造纸业发展不无裨益。故笔者不揣简陋,以就教于方家。

在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纂的《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中,有三件涉及元代用纸的文书引起笔者的注意,即第二册第361页编号为M1·0261[F9:W24]的文书、第二册第428页编号为M1·0322[F51:W12]的文书、第五册第1072页编号为M1·0848[F270:W9]的文书,为方便说明,现将各录文列示如下:^①

(一) 编号为M1·0261[F9:W24]文书

[前缺]

1. 粮房椽史颀玘今关到□明纸式□。
2. 揭贴文簿用□此□用?^②
3. 正月初六日椽史^{颀玘}_{张舒}^③
4. 帖子上得三百一十七张

[后缺]

(二) 编号为M1·0322[F51:W12]文书

* 本文为2010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0YJC770021。

① 这三件文书在李逸友编著的《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中均有著录,笔者即以此为底本,参照《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图版,并按照敦煌吐鲁番文书整理规则进行整理。

② 李逸友书中录文为“揭贴文簿用此为用者”。

③ 此处两个人名后都有签押符号。

1. 上元杂用物色数目 .
 2. 红纸廿张七两 青 .
 3. 黄纸一十张二两半^① 黄 .
 4. 法明纸五十张一十五两 枝子 .
 5. 固青 两^② 干脂 .
 6. 油三两 麻 .
 7. 板一片半四两半 柴五两
 8. 支与饷钱五两^③ 支与酒 .
 9. 赵待诏取纸八张二两^④
 10. 总计钞
-^⑤

(三) 编号为 M1·0848[F270:W9]文书

1. 奉
2. 总府官 .
3. 即将合用 .
4. 分司公用纸 .
5. 府对物支价 .
6. 夹纸式伯 .
7. 清水纸 .

[后缺]

以上三件文书,《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的定名分别是:(一)钱粮房用纸文书;(二)上元杂用物色账;(三)公用钱物文书,为论述方便,姑且从之。在文书中,有诸如“法明纸”、“夹纸”、“清水纸”等表述用纸的字样,这些纸名的出现应该有很强的时代特征,其或多或少的在某个方面折射出元代造纸工业的发展状况,使我们对造纸在元代乃至整个人类文明进程中所起的作用有个重新认识。

在《钱粮房用纸文书》和《上元杂用物色账》两件文书中均提到同一纸——法明纸。^⑥关于法明纸,笔者于现有文献中尚未见到相关记载,但从《钱粮房用纸文书》的内容看,此纸用途较为清楚,即做“揭贴文簿”之用。那么,何为“揭贴文簿”?所谓揭贴,即揭示,揭而贴之意。古贴、帖通用。《辞源》“揭帖”条所引元代虞集《道园学古录》八《京畿都漕运使善政记》中云:“其出纳也,务为均平。收支之数,有所勘会,止从本司揭贴图帐申报,无烦文也。”可见元时的这种“揭贴”即指收支情况的书面报告。^⑦具体到本件文书,法明纸即用来书写钱粮房上报的收支账目。在《上元杂用物色账》中,我们可以推算出法明纸的单张价格,五十张一十五两,则每张用银三钱,与文书中红纸、黄纸单价比较而言,价位居中。^⑧

① 李逸友书中录文为“三两半”,现根据图版径改。

② 李逸友书中录文为“五两”,但照图版,“两”字前面正好有残,很难判断所缺为“三”还是“五”字。

③ 李逸友书中录文为“伍钱”,今据图版径改。

④ 李逸友书中录文为“三两”,今据图版径改。

⑤ 以下文书还有六行,因与文章讨论内容无关,在此不述。

⑥ 从“钱粮房用纸文书”内可以确切看到“明纸”二字,前面一字有残损,难于辨认。但根据所剩笔画及“上元杂用物色账”中列“法明纸”一项,笔者认为“钱粮房用纸文书”里提到的也当是法明纸。

⑦ 童昭彦《古代文书「揭帖」考》,《浙江档案》1999年第11期,第40页。

⑧ “上元杂用物色账”中显示,红纸二十张用银七两,单张价格为银三钱五分;黄纸一十张用银二两半,单张纸价为银二钱五分。

由于两件文书所给信息有限,我们无从得知法明纸的名称来源、制作工艺及其他,但文书内容的细节至少透露出元代亦集乃路经济的某个方面,比如支出的浩繁及财政的捉襟见肘。按《钱粮房用纸文书》,粮房椽史颀圪领到法明纸贰佰多张,^①与实际需要多有差距。^②钱粮房“揭贴文簿”用纸尚不能满足,亦集乃路地方财政的窘迫状可想而知。

《上元杂用物色账》内还列有两项纸名:红纸和黄纸。在中国古代的各种纸中,有一种纸曾被许多封建王朝指定为官府公文用纸,为保存中国古代典章制度,丰富档案馆藏作出了重要贡献,那就是黄纸。^③将纸染成浅黄色的工序,称为“染潢”,就是将纸张放在黄蘗汁中浸染。黄蘗树的汁液以其芳香和杀虫功效,可以辟虫豸,染过色的纸可防止虫蛀,延长纸的寿命,并使纸面光洁,故自问世以后,就逐渐成为中国古代官府公文中的重要用纸。最早强调公文用纸需用黄纸的是东晋。晋安帝元兴三年(404),桓玄下令曰:“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恭。今诸用简者宜以黄纸代之。”^④至唐代,黄纸的使用范围扩大。不仅皇帝的诏制用黄纸书写,起居注、科举考试后发榜的榜文及户籍册等也使用黄纸。^⑤随着黄纸需求量的大增,出现了专职染潢的职业。敦煌残卷中,有于671—677年缮写的约20部佛经,署名了装潢匠的名字,也有数部提到了装潢匠,但姓名不详。^⑥《唐六典》及《旧唐书》中记载,弘文馆有装潢匠九人,崇文馆有装潢匠五人,秘书省有装潢匠十人。他们即负责加工处理纸张,以供书写文件之用。黄色在唐代被确立为尊色,并为后世沿用。宋朝建立后,官府公文继续使用黄纸,但使用范围开始逐步缩小。《庆元条法事类》卷一六云:“诸翻录制敕,其纸用黄”、“诸被受手诏以黄纸造册编录”。^⑦而文武官员上行文书则用白纸。据《宋史·职官志》载,枢密院“先具所得旨关门下省审覆,面得旨者为录白,批奏得画者为画旨,并留为底。惟以白纸录送,皆候报施行”。^⑧直至元明清,黄纸都有使用。

纸的染潢主要目的是为防蠹蛀并延长寿命,而纸的着色则是为了美观。已知年代最早的着色纸张可能是汉朝的“赫蹏”;公元3世纪孟康称之为“染纸素令赤而书之。若今黄纸也”。如果这是正确的,则早在公元前1世纪即已使用红色纸张了,而黄色纸张在公元3世纪开始应用。东汉时宫廷中,皇太子初拜,给赤纸、缥红麻纸各100张。^⑨西晋时,诏令文书用青纸。到了东晋,则出现多种色纸。如桓玄“诏平准作桃花笺纸及缥绿青赤者”。^⑩我国古代有重正色,轻间色的传统。以青、黄、赤、白、黑为正色,其他杂色为间色。正色纸常用于官府公文,纸色上的差异成为体现封建等级的标识之一。

元代的典章制度中对于文书用纸的情况说明不多,不及宋有《庆元条法事类》之规定,更不及明有完备、严格制度之约束。有关黄纸的阐述,《元史》卷八一“选举志”云:“监试官同读卷官,以所对策第其高下,分为三甲进奏。作二榜,用敕黄纸书,揭于内前红门之左右。”“敕黄”,即敕书,因用黄纸书写,故名。我们所见元代有关黄纸的直接用途系发放榜文所用,但从“敕黄纸”一词来看,其用来书写敕书是不错的。至于红纸之用,丁春梅女士在《中国古代公文用纸等级的主要标识》一文中介绍,元代在封赠文书中以色纸不同来区分官员的等级。其时,封赠文书有宣命、敕牒两种,依据官员品级的不同而使用不同颜色的纸,“元之宣敕皆用纸。一品至五品为宣,色以白;六品至九品为敕,色以赤”。^⑪

前面已经分析,三种纸张红纸单价最高,法明纸次之,黄纸则最低,这从侧面也反映出黄纸在历

① 文书中“式”字以下缺失,使具体关到法明纸数不详。按常理推断,此“式”字下缺失单位当为“佰”而非其他。虽确切数字不明,但大致数为贰佰多张似无疑义。

② 按文书所言,“帖子上得三百一十七张”,此数当为实际需要量。

③ 丁春梅《浅谈黄纸与我国古代官府公文》,《档案学通讯》2000年第5期,第51页。

④ 苏易简《文房四谱》卷4《纸谱》,《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⑤ 丁春梅《唐代官府公文用纸制度研究》,《档案学通讯》2005年第4期,第96页。

⑥ 钱存训《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1页。

⑦ 佚名《庆元条法事类》卷一六《文书门》,中国书店1990年版,第180页。

⑧ 《宋史》卷162《职官志》。

⑨ 钱存训《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第72页。

⑩ 苏易简《文房四谱》卷4《纸谱》。

⑪ 叶子奇《草木子》卷3。

经诸朝特别是唐宋的广泛使用，其制造成本不断下降，从而单价较低；红纸概由未大规模应用，制作工艺复杂，材料成本消耗较多，故单位价格偏高，这也属情理中事，符合“物以稀为贵”的经济规律。

中国纸的种类繁多，名称各异，这正好反映了造纸术的日趋进展。有些纸名代表其制作的原料，有些源自制作的地区，也有取自设计名家的名号，更有些纸因加工制作或形式、大小、用途等等而得名。^①本文所讨论的元代纸张名称，除了前面所提法明纸外，还有《公用钱物文书》中的夹纸与清水纸。夹纸称谓的得来，笔者以为当与其加工制作形式有关。夹，《辞源》上解释为从左右相持，并引用《说文》云：“夹，持也。从大，侠二人。”清段玉裁注：“捉物必以两手，故凡持曰夹。”《中国古籍版刻辞典》中有关于“玉版宣纸”的介绍，大致说其为印书用纸之一，“色白，质细而厚，很能吸收水分。韧性比棉纸略差。单层者称‘单宣’，双层者称‘夹贡’”。^②夹贡，又叫夹宣、双宣，与单宣相对，指双层或多层宣纸。由此及彼，夹纸的概念也该如此。从制作形式来讲，有两层以上的纸称为夹纸，只不过其未必是宣纸，而可能是竹纸或其他纸。有关史料记载中，较早出现“夹纸”一词是在宋代，比如宋人岳珂所撰《宝真斋法书赞》、王袞编撰《博济方》等等，过滤杂质是夹纸的其中一项功能。至元，“夹纸”种类与用途扩大。《元史》卷一百一“兵志”中有关于“急递铺兵”工作状态的记载，对传递文字的包装形式亦有明确说明，“各处往来文字先用净检纸封裹与上，更用厚夹纸印信封皮”。而在元代的宗教塑绘中，也使用夹纸。如《经世大典·工典·画塑记》记载了阿尼哥及其弟子们创作作品所用材料中就有“江淮夹纸一千二百张”。^③除此之外，元代还有“上静夹纸”。^④到了明代，夹纸类型更加多样化，有中夹纸、毛边中夹纸、大中夹纸、白大中夹纸、青夹纸等。^⑤

清水纸，史料未详，笔者以为系因制作地区而得名。清水县，“秦陇西郡地。汉置清水县，属天水郡。后汉废为陇县地，晋复置，属洛阳郡。后魏因之。隋属天水郡。唐武德四年，于县置邽州。六年，州废，县属秦州。大历以后陷于吐蕃，大中间收复，隶凤翔府，仍属秦州。宋因之。金置冶坊县，元以冶坊并入，明如之”。^⑥按清水县地处关山西麓，宋金元之际，这里东通关中，北达宁夏，西出陇右，是重要的军事商旅驿路，也是宋金元彼此争锋的边境地区，为金国所辖。元统一后，将原秦州所辖成纪、秦安、陇城、清水、冶坊五县并为三县，其中冶坊并入清水，属秦州。^⑦据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版《清水县志》卷二载，清水县土产有木类，其中不乏造纸所用原材桑、竹等。而民国三十七年（1948）版《清水县志》卷一《舆地志》“物产”条中，更列纸张为“郭纸、合儿纸之属”。^⑧从县志记载看，清水县具备发展造纸业的基本条件，并且把“郭纸、合儿纸”等纸张作为当地物产之一，因此，笔者以为清水县的造纸工业很可能在历史上就占有一席之地。那么，其造纸工艺究竟可以追溯到哪个朝代呢？《公用钱物文书》中出现的“清水纸”，很可能是以清水为制作地而命名的纸张，换言之，清水县应该至少在元代就有了造纸业，历史可谓悠久。如果真是这样，“清水纸”的出现则弥补了清水县造纸史的一项空白。

文书反映的清水纸是否为清水县生产纸张就成为问题的症结所在。前面所述三件中国藏黑水城文书均有反映元代亦集乃路总管府及其司属部门领用或耗费纸张的情况，亦集乃路的用纸有没有可能从清水县地运输过来是关键。按亦集乃，西夏语意为“黑水”，原为西夏黑水城，西夏西北部军事重镇。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于此置亦集乃路，辖境北至居延海，西北接沙碛，相当于今内蒙古自治区西北端额济纳旗一带。而亦集乃路与清水县在地理位置上的特殊性决定了他们之间有关联是在所难免的。

① 钱存训《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第83页。

② 瞿冕良编《中国古籍版刻辞典》，齐鲁书社1999年版，第89页。

③ 转引熊文彬《元朝宫廷的“西天梵相”及其艺术作品（上）》，《中国藏学》2000年第2期，第29页。

④ 参见元王士点撰《秘书监志》卷4。

⑤ 参见《江西通志》卷27《土产》；《太常续考》卷7。

⑥ 参见《甘肃通志》卷3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⑦ 温小牛《成吉思汗病逝清水县新考》，来源于清水县政府门户网站
http://www.tsqs.gov.cn/html/qshrw/2010-5/7/17_39_48_482.html。

⑧ 刘福祥等《清水县志》卷一《舆地志》，1948年石印本，第30页。

我们知道，元置中书省总理全国政务，因幅员辽阔，除腹里地区直隶于中书省、吐蕃地区由宣政院管辖外，又于诸路重要都会设立十个行中书省，以分管各区。据《元史·地理志》载，甘肃等处行中书省为“路七、州二，属州五”；陕西等处行中书省为“路四、府五、州二十七，属州十二，属县八十八”。陕甘等处行中书省涵盖了西北大部，其中，亦集乃路属甘肃等处行中书省；清水县归秦州，秦州属陕西等处行中书省。元朝地域辽阔，交通设施的完善是政治统治和经济开发的必备条件。为此，元政府继承历代驿递制度，在全国设置了数以千计的驿站和急递铺。陕西等处行中书省、甘肃等处行中书省及西域的陆、水、马站接连不断。^①如陕西等处行中书省有“陆站八十处，水站一处”，甘肃等处行中书省有“马站六处”。^②如此发达的驿递制度，对促进贸易交流也会起到一定作用。陕甘两处行中书省都属西北地区，位置紧邻，且元代此地区战事频仍，保证军需供应一直是重中之重。我们可以想象，两地的军资运输在非常时期当较为频繁。这是因为两地除了有驿站四通八达之便利，更为主要的是地理位置上的优越条件——两行省紧邻，这就为节约时间、确保战事顺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而，亦集乃路所需纸张等物资由清水县发运而来是非常有可能的，这就解决了“清水纸”名称来源的问题。同时，也将清水县的造纸历史上延至元，对地方志的研究起了有益的补充。

历代纸名，不胜枚举：灞桥纸、左伯纸、竹帘纸、藤纸、鱼卵纸、棉纸、黄麻纸、宣纸、硬黄纸、澄心堂纸、金花纸、薛涛笺、谢公十色笺、竹纸、高丽纸等等等等。经专家研究，每个时期我国的纸品都出现“此消彼长”的态势，一批纸品消失了，另一批新纸又诞生出来。^③金代北方多产纸，而元代名纸则仅限于浙、赣。明董其昌云：“元有黄麻纸、铅山纸、常山纸、莢山纸、上虞纸，皆可传至百世。”明高爽云：“元有彩色粉笺、蜡笺、黄笺纸、花笺、罗纹笺，皆出绍兴。有白笺笺、观音纸、清江纸，皆出江西。”元代印刷物料之生产既不及宋，也不及金。^④即便如此，随着印刷术的发达，元代造纸工业还是遍布全国，除东南一带，“四川夹江的连史纸，贵州、云南的皮纸等都各有特色。”^⑤

以上三件用纸文书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元代造纸工业的发展及地方财政的吃紧。即便在不甚发达的边塞地区用纸，也还是区分诸如法明纸、黄纸、红纸、夹纸、清水纸等等品种，这印证了元代商品流通的发展，全国纸张交流；但另一方面，官府正常用纸都不能得以保障的事实，则又深刻揭示了亦集乃路地方财政入不敷出的窘状。

（作者通讯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图书馆 050011）

① 李清凌《元明清时期西北的经济开发》，《西北师大学报》2003年第6期，第111页。

② 以上数字见《元史》卷六〇《地理志》。

③ 刘仁庆《论硬黄纸》，《纸坛纵横》2011年第4期，第69页。

④ 张秀民《中国印刷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37页。

⑤ 李干、周祉征《中国经济通史》第六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15页。